

病毒溯源工作不应被政治操弄

——多国政要、专家学者等发声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 人民日报记者 吴刚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病毒溯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连日来，多国政要、学者和专家等纷纷发声，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抗疫合作，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应加入政治因素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8月16日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他说，一些西方国家操纵病毒起源问题，旨在攻击中国，委方谴责这一“卑劣行径”。马杜罗感谢中国向委内瑞拉抗疫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表示大量来自中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了抗疫物资供应，委方将继续与中国保持长久合作。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13日说，新冠病毒溯源不应加入政治因素。他认为，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不人道的，各国科学家必须共同努力找出疾病出现变异的原因。“我们要知道事实，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知道真相只是推卸责任，就无法最终战胜疾病。”潘坎说：“不论是病毒溯源还是寻找病毒出现变异的原因，都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应加入政治因素。”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0日称赞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作贡献，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和污名化。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团结，拒绝将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政治化、特指化、污名化；古巴认可中国本着透明、负责态度为抗击疫情所作贡献。

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病毒溯源工作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被政治操弄。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向世界各国分发足够的疫苗，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许多富裕国家积累了大量疫苗，但他们没有与那些较贫穷的国家分享。”莫门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孟抗疫斗争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马耳他外交部长埃瓦里斯特·巴尔托洛表示：“我们的敌人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彼此。我们要弄明白疫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这一切都应该基于证据。我们不应该借公共卫生来玩弄政治。”

所谓“实验室泄漏论”经不起科学审视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近日在署名文章中说，疫情暴发之初，个别国家就存在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情况，甚至封城、接种疫苗等措施也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还混杂

了许多阴谋论调。一年多过去了，这样的论调仍能听到。新冠病毒溯源更是被严重政治化，直接导致仇恨犯罪增加。

埃及前驻华大使阿里·希夫尼表示，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主要是迫于某些大国的压力，且出于一些政治化因素的考量。他认为，部分西方国家向世卫组织施压，根本目的是要激起舆论对中国公布疫情信息透明度的怀疑，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通过给许多问题和危机附上政治色彩来实现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希夫尼说。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所有这些说法（‘实验室泄漏论’）都经不起科学审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病毒基因组学负责人戴维·罗伯逊说：“目前，所有数据都强烈地指向一个方向，即这是一种自然病毒，而不是实验室制造的病毒。我们需要相信已有证据，相信有研究病毒进化及出现方面经验的专家。”

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日前表示，新冠病毒溯源是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始终秉持科学、专业、客观精神，坚定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支持

和引导全球抗疫和溯源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马尔代夫媒体人哈姆丹·沙基尔8日在“马尔代夫新闻网”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偏离科学事实，将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政治化。文章说，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合作，并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透明和科学的调查，但是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采取了顽固立场。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的政治化和偏离科学事实的行径，是完全不道德的“栽赃嫁祸”，目的是为其未能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不能控制本国疫情推卸责任。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埃莱娜·雷耶斯日前表示，应将病毒溯源工作视为抗疫“机遇之窗”，共同整合有限的抗疫资源，加大力度培养生物医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才。同时，各国遇到错误信息或信息遭到扭曲时，也应基于科学证据及时解释说明。

巴尔托洛表示，全球面临着疫苗接种严重不均的挑战。“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且随着病毒的变异，这个阶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长。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只有世界各国普遍安全，本国才能安全。”巴尔托洛认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或者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找到合作的方式非常重要。”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3日第16版）

2020年6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载了一篇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评论文章。在美国政府当时不断吹嘘其抗疫成就的背景下，这篇文章给美国贴上“失败国家”的标签，格外引人注目。文章直言，新冠危机要求迅速、理性和集体的应对，美国却表现得像一个基础设施落后、政府运转失灵的国家。

彼时，文章作者、《大西洋月刊》记者乔治·帕克在文末“喊话”美国政府，“攻克疫情的战斗，还必须是一场恢复我们国家健康并加以重建的战斗，否则，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苦难和悲痛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美国作为拥有充足医疗资源与完整应急管理体系的超级大国，依然深陷疫情泥沼。美国目前已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的上升期，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自7月起快速上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美国8月20日新增确诊157450例；19日前7天日均新增确诊134859例，为今年2月2日之后的高新。

仍在攀升的病例数字，与此有关的频发社会冲突和危机，让彭博社6月初将美国推上“全球抗疫韧性”排行榜榜首、美国俨然成为“抗疫全球第一”国家显得极为讽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近日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用翔实数据证明，美国堪称“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头号强国”何以沦为“第一抗疫失败国”？美国抗疫失败给全球增加了哪些风险？美国个别政客和媒体反复就新冠疫情抹黑他国、转移民众注意力，未来该如何应对？就相关问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8月19日专访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

美国是抗疫“头号战败国”渐成共识

在陈向阳看来，“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的名号，美国“当之无愧”。他早在去年的《东北亚学刊》第5期上就发表《疫情影响下的国际政治：撼动霸权，打造多极》一文，提出过类似观点。文章说，由于美国民粹政客当道，其抗疫表现实在糟糕，疫情几乎失控，美国因而成了抗疫“头号战败国”；错误的“美国优先”，导致美国疫情最重、失道寡助。

美国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数继续在全球“遥遥领先”，同时却放任病毒输出危害全球，也继续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溯源”，打压说真话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陈向阳说，这充分证明，美国是抗击新冠疫情“事实和道德上的双料‘头号战败国’”。在与国内外学者交流的过程中，陈向阳发现，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美国治理体系弊端暴露无遗

中国智库报告《“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发布后，一时成为全球热议焦点，数十家国内外主要媒体报道，数次登上中外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全球阅读量逾5亿。英国《独立报》8月10日刊文引用研究报告分析和结论说，美国两大党派竞争下的联邦体系未能承担起责任，在不同层面上推诿扯皮，这构成了抗击大流行病时“不团结的美国”形象；美国不是在遏制病毒的全球传播，而是在从事“病毒来源追踪恐怖主义”。

谈起美国抗疫失败、乱象丛生的原因，陈向阳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一，从政府到民众，美国在思想上对新冠病毒麻痹大意，过于轻“敌”甚至狂妄自大。前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称，“与流感相比，新冠病毒在大多数群体中远没有那么致命”。推特因这些言论“可能含有误导性信息”而对其贴上了警告标签。

第二，美国政府没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正确指导，也没有人民安全概念，没能做到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抗疫与经济复工复产，总是过早解封、急于经济复苏，招致疫情反复反弹。去年4月，美国第一波新冠疫情仍处于高峰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超过3万例，特朗普却在4月17日连发三条推文，敦促“解放”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所在州解封过早，致使疫情反弹风险大大增加。

第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将选战凌驾于抗疫之上。疫情从发生之初就沦为两党政治角力的工具和讨价还价的筹码。特朗普一再忽视疫情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风险；民主党则在其主政的各州热衷于“打嘴仗”，无暇在实际抗疫行动上有所作为。两党将抗疫和疫苗接种政治化，致使“鹬蚌相争、病毒得利”。

第四，变异病毒不断涌现并在美国迅速蔓延。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8月17日报道，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持续蔓延，包括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美国有5个州上周平均日新增确诊病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8月8日接受美媒采访时坦言，美国在遏制“德尔塔”感染病例数激增问题上失败，“现在正在付出可怕的代价”。他说，政治因素使美国公众对缓解流行病战略的意见分化，强制接种疫苗或者戴口罩变成了表明政治立场的行为。“我们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真的不需要在对待一种正在杀人的病毒问题上两极分化。”

党同伐异的两党制、各自为政的联邦制、反科学反常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将病毒污名化的种族歧视、个人至上的所谓“民主、自由”……陈向阳表示，美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弊端，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暴露无遗。

“美国风险”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作为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无法控制本国疫情，对全球抗疫大局造成了巨大冲击。陈向阳指出，由于美国抗疫不力、放任病毒扩散，全球取得防控新冠疫情胜利的时间被大幅延长。加上奉行“美国优先”的“疫苗民族主义”，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疫苗、备受疫情折磨。美国还胁迫、干扰世卫组织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严重扰乱国际抗疫合作大局，直接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据路透社8月1日报道，由于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有拉美国向COVAX支付的疫苗款项遭遇拦截，导致COVAX迟迟未能分发疫苗。美国还拖延兑现为COVAX捐助5亿剂疫苗的承诺，迄今捐出还不到2000万剂，同时在国内继续囤积巨量新冠疫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8月10日报道说，在美国有数百万剂疫苗已经过期或接近过期。仅在7月份，阿肯色州就销毁了8万剂过期疫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表示，疫苗公平是实现人权的关键，如果不能确保公平获得疫苗，那将是一个新的道德崩塌。

在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三家智库推出的《“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是对彭博社反科学反常识、荒谬地将美国送上全球抗疫“排名第一”的一次回击。对于美国社会撕裂、抗疫被党派利益绑架，陈向阳说，外人除了叹息，实在是爱莫能助，能够做的，就是持续揭露美国对外用锅栽赃的真相，揪出美国抗疫失败的内在原因，以正视听。

8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依据中国智库报告发表题为《中国称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内斗导致美国成为“第一抗疫失败国”》的文章，较为客观地介绍了报告内容：“报告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美国的说法，即‘武汉病毒实验室可能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起源’，指出美国是‘疑似暴发源’。”该媒体机构当天还联系白宫询问其对报告的回应，但白宫未予置评。

（原载8月22日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第一抗疫失败国』名号美国『当之无愧』

只为资本 不为苍生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医疗体制之痛

■ 俞凤 魏南枝

“疫情海啸”再度席卷美国，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的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的疫情曲线在过去一年多里从未被“拉平”过，累计感染病例已经超过3800万、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64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盛的医疗体系和顶尖的医疗技术，号称拥有最优秀的公共卫生队伍并建成了最完备的应急管理体系，却交出这样一份“不及格”的疫情防控答卷，不仅让美国人民愤懑，也让国际社会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水平持续增长，2020年医疗卫生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高达18%。强生、辉瑞、默克、再生元和史赛克等美国著名医药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激增，股价也屡创新高。疫情防控一败涂地，却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强烈的反差令人们出离愤怒，这是个什么医疗体制？！它究竟是为资本还是为生命？

美国医疗体制：先进与落后畸形并存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其分配给医疗卫生的资源水平。长期以来，美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人均医疗成本最高的国家。然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却严重落后，能够覆盖广泛中下层人口的基础医疗服务十分滞后。先进性和落后性畸形并存的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无遗。

巨额投资下的美国医疗资源世界领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占比的两倍，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更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的两倍之上。

在如此高昂投入之下，美国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从市场表现来看是世界一流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市场，占全球药物市场份额的1/3。根据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数据，美国公司进行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药物研发，拥有大多数新药的知识产权。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评价与研究

准了59种新型医药产品，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部分产品是针对罕见病的。美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医学人才，2020年的3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就有两位美国人。除此之外，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设备市场。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美国医疗设备市场规模高达1560亿美元（占全球医疗设备市场的40%），预计到2023年将增长到2080亿美元。

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居高不下源于资本垄断。相比经合组织的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医疗卫生公共支出的水平基本持平，高出部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私人医疗支出。也就是说，美国的医疗体制之下是有钱人的天堂。以平均住院成本为例，美国的住院成本高达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住院成本的两倍，而价格是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之间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造成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于大资本对医疗行业的垄断。美国的医疗行业是个高度垄断的行业，缺乏自由竞争。大资本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紧紧把控住院服务和医药产品的定价权。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医院的人工费用、服务费用和医疗产品的价格被不断哄抬。不仅如此，美国医学会、美国医院协会和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等利益集团每年更会投入大量政治献金，通过游说寻求其在政治领域内的代言人，推行有利于医疗服务供应方的政策，从而强化他们的市场力量。

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长期滞后。美国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人均行政费用约为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远远超过美国在疾病预防或长期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因此，尽管医疗卫生支出很高，但是从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常见健康指标看，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比诸多经合组织国家差。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帮助各级政府有效预防疾病并为紧急情况持续挑战做好应对准备，但缺乏盈利空间。与美国所拥有的顶尖的医疗人才、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丰富的医疗资源相反，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近年处于长期滞后状态。美国各州的公共卫生部门资金长期不足，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基金也被大幅削减。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近4万个

工作岗位被裁撤，同时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管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的联邦资金被削减了近半。由于美国的防疫体系依赖于各州卫生部门的检测和病历跟踪，再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进行信息汇总和指导部署。因此，长期滞后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直接导致了疫情中各州卫生部门人手的严重短缺，从而造成了防疫过程中检测能力、病历跟踪能力、安排治疗能力的落后和抗疫的低效。这也可以部分解释美国昂贵的医疗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了。

资本利益主导下，美国医疗体制抗疫必然失灵

资本裹挟下的美国医疗体制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投资不足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人民获得基本卫生保障的可能性。这是造成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在疫情中，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凭借疫情大肆敛财，美国的底层民众却因无法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而深受其害。这种资本利益主导下的美国医疗体制必将导致美国式抗疫的失灵。

美国医疗大资本借新冠肺炎疫情刺激财富激增。资本从来不是为了了解决危机，而是借助危机来攫取高额利润。在此次疫情之中，美国的医院和医药公司并未降低医疗费用——事实上，与欧洲相比，美国境内各类新冠疫苗的价格普遍高于欧洲。通过疫苗的研发与专利申请、医疗资源的挤兑等方式，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在此次疫情中赚得盆满钵满。

以美国几家著名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生产公司的业绩为例。从2020年3月至今，美国的强生、辉瑞、史赛克和再生元制药等公司的股价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辉瑞公司2021年中报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8.24%，再生元制药2021年中报的营业收入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2.83%。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以美国蓝领工人和日益衰弱的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大部分美国人还处于艰难度日之中，沦为疫情和经济大衰退的受害者。不仅如此，大量低收入人群在获取食物、保持工作岗位和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方面困难重重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资金投

入股市，以此作为仅有的投资渠道，从而导致海量资金涌入美国股市，又进一步使美国大资本的财富暴增。

美国政府的救助政策意在救资本而非救人命。资本所垄断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政策制定。美国利益集团强大的游说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疫情之中，美国两党政客提出的抗疫措施都是从背后的资本集团利益出发，并且迎合自身的选民需求以扩大政治基本盘。政府奉行“资本至上”的行事逻辑，对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医疗费用昂贵问题，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去改变——不仅没有通过大幅降低医疗成本来控制疫情，反而维护大资本的利益，一味追求经济复苏而忽视了对国民生存权的保护责任。

观察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提出的疫情救济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的救济政策倾向于维护资本利益。特朗普签署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共计投入2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但其中与医院、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相关的经费仅有1800亿美元，仅占总投入比例的9%，而给大公司企业、小型企业的贷款基金则分别高达5100亿美元和3770亿美元，占总投入的44.35%。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签署的经济救助计划，计划投入1.9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其中直接金融援助高达6561.8亿美元，占总投入比例的34.5%，而卫生领域仅投入862.4亿美元，占总投入比例的4.5%。

美国的医疗体制为垄断大资本服务，垄断资本主导着美国的医疗卫生政策设置，因而在不断强化大资本的垄断性。这种“为资本不为生命”的体制特点决定了，美国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缺乏团结抗疫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基础，也决定了美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失败。

（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8月23日第13版 作者：俞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南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